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http://joemls.tku.edu.tw>

Vol. 48 , no. 1 (Fall 2010) : 119-144

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

A Discussion on Defini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Collectors in Mi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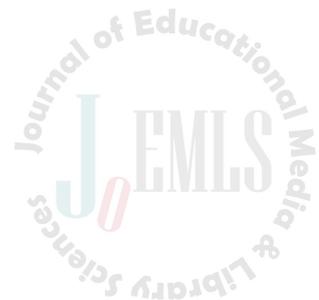
陳冠至 Kuan-Chih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E-mail: 080677@mail.fju.edu.tw

[English Abstract & Summary see link](#)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 以明代為例

陳冠至

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

E-mail: 080677@mail.fju.edu.tw

摘要

藏書史研究的內容極為豐富，包括自古以來各種藏書機構和私人的藏書活動，以及典冊與圖書本身，還有諸如圖書的收集、購求、鑒別、保藏、研究與散佚等專業範疇，藏書思想與方法理論，也囊括與藏書活動關係密切的刻書、書肆、流通與傳播等社會風尚，和因藏書風尚產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背景等等，都屬於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非常值得深入探究。但是，藏書史研究往往受限於有關古代「藏書家」的定義，因為累朝歷代對於「典籍」的認知略有不同，才會造成藏書史研究上的根本問題。反觀歷年來的藏書史研究，針對古代藏書家的定義而作的專論寥若晨星，事實上，在定義時也存在著很大的困境。本文即試圖從史料中梳整出一條理路，暫以明代的藏書家為例，替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作出部分釐清與說明。

關鍵詞：藏書家，定義，明代，藏書史

前 言

由於書籍載體形式與裝訂方式往往因時代先後而有所不同，加上累朝歷代的藏書愛好者在當時的史料記載上甚少被直接稱為「藏書家」，使得歷來藏書學研究對「藏書家」一詞難下定義，無法統一。其實，古代「藏書家」的義涵必須按照各個朝代的特徵、研究者的學科領域與研究目的，分別去做不同的解釋，因而成為藏書研究上的一個難題。以字義上來看，凡稱「家」者，理應在藏書專業領域上具有特別的建樹。但考之中國近現代藏書研究慣例，學者在收錄古代藏書家時，多以目染耳濡，或史料上記載其人曾經從事或參與藏書行為，或

特別標明其藏書興趣，或其家以收藏典籍數量眾多，完全按照研究者個人的判斷標準，甚至還不乏收入一些引人爭議的古董與文獻收藏者。邇來雖有許多學者嘗試對中國古代的「藏書家」下定義，卻仍無法改變這種情況。例如范鳳書認定「藏書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卻又將藏書故實僅載「所蓄法書名畫、金石遺刻數千餘種」的羅鳳（1460-？），列為「明代收藏萬卷以上藏書家」，而邊貢（1476-1532）的藏書事蹟也類如此（註1）。類似這樣的例子在現今的研究成果中不勝枚舉，很多藏書史上並無顯著事蹟的收藏愛好者，也都被列入古代「藏書家」之林。

顧名思義，「藏書家」自然是指收藏典籍的著名人士，所藏書籍，又可從數目與質量上來分論。在數量上，凡是藏書卷帙或冊數眾多者，固然可稱為「藏書家」，但歷史上有些重質不重量，或偏好收藏某類文物、古董和一些形式特殊的載籍者，也都被稱為「藏書家」。例如明末曾經自稱：「予家藏雜劇，多秘本」的臧懋循（？-1621）（註2），以及清朝專佞宋板書的黃丕烈（1763-1825）等人（註3），皆是如此。其實，宋板書在清代已經算是文物，而小說在明朝也非歷來典籍的主流，因此，收藏這類文獻是否可以稱為「藏書」，值得商榷。但許多人堅稱即便明代中央與地方政府偶有關於演出和收藏戲曲的禁令，實多為具文而已，所以當時不少藏書家都藏有數量不等的小說或戲曲，何況更有以此名家者（註4）。同時，他們也認為古代一些藏書家如果對於某類圖書特別感興趣的話，譬如戲劇和小說，相關的書籍自然就會收集得特別齊全，這對圖書文獻的保存也有相當的助益（註5）。

此外，古代一般讀書人免不了會進行購書、抄書等圖書徵集的活動，他們的目的多半不是為了成就藏書家之名，只能說是一個傳統知識份子的本業與宿命而已，但有些人卻因而擁有連屋充棟的藏書，類似這種情形，是否也該納入藏書家之林呢？再者，板本知識豐富的古代「書商」，其藏書目的往往只是為了營利，這樣是否也可視為藏書家？凡此諸多問題，在今日學界眾見紛紜、各抱其說的情況下，任何人要為古代的藏書家立下一個合理且客觀的定義，誠非易事。

以上種種，皆因中國古代典籍的發展歷史十分悠久且形式多樣，從甲骨、金石、簡帛、手抄本……等各式各樣的文獻，一直到雕板印刷術普及以後大量流通的刻印本，隨著主流載體的變遷，人們對「書」、「藏書」或「藏書家」的印象與認知都不盡相同，而後人僅能從存世的史料中追尋蛛絲馬跡，考量藏書家生存年代的時空背景，尊重當時的紀錄，企圖給予合理的解釋與批判。特別是從雕板印刷普及的宋代開始，人們對刻本書的認同日趨濃郁，不論私人或公家，藏書事業一日千里，在全國大肆地拓展開來，各地藏書文化紛紛成形，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更加呈現出空前發達的面向，而古代的藏書經

驗、技術與理論，至此也進入總結。但不似清朝因為受到考據學風的影響導致藏書理論的相對嚴謹，由於明代各方面文化以及生活條件的高度發展，加上復古運動的推波助瀾，表現在私人藏書事業上面，藏書家的收藏品顯得十分多元與自由，這使得當時社會大眾對藏書家的印象與標準，較之清代，也隨之較為寬鬆及包容。因此，筆者基於多年從事明代藏書史探索而積累的些許經驗，試圖以明代為例，說明當時人們對「藏書家」的意識和看法，作為明代藏書史研究的一項參考。

二、近人有關「藏書家」標準的論述

關於「藏書家」的標準或定義，歷來學者們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註6），不過沒有推結出定論，這很可能與各朝各代、不同時期的文化與社會背景差異、書籍載體的變化，以及研究主題、目的或領域的不同有極大的關連性。例如清代以來，許多學者開始反思中國古代「藏書家」的意義，他們的觀點互異，各持己見。例如洪亮吉（1746-1809）曾將藏書家分為五等，凡「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1728-1804）、戴吉士震（1724-1777）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謬，是謂校讐家，如盧學士文弼（1717-1796）、翁閣學方綱（1733-1818）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天一閣』、乾塘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鄆鎮鮑處士廷博（1728-1814）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面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註7）不過，古代的藏書家實際上無法按照洪氏所舉一一歸類，在多數的情況下，他們往往一身兼有數種類型，或在某一方面比較偏重（註8）。

此外，洪氏藏書家有五等的說法亦遭到今人趙飛鵬的嚴厲批判，首先是「藏書家」含義的問題，其次是藏書家是否可以分等的問題，還包括強行以某一種固定的名稱或分類來規範一位學者時，對其認知上產生的局限問題。也就是說，趙氏認為洪亮吉在「藏書家」的定義沒有獲得合理解釋的情況下進行推衍，把學者、藏書家、書商混為一談，又強分優劣，錯誤更深，確實沒有一套客觀標準，絕非一個嚴謹的學術評論（註9）。

又如洪有豐（1892-1963）也認為「藏書家」應指收藏印刷術發明以後的刻印本者，他說：

溯私人之「藏書家」，應自有板刻始，蓋由是而後，書籍日富，鄴架琳

瑯，不難致也。板刻或謂始於五代，或謂其前早已有之，而必至五代及宋初始盛可知也(註10)。

若按洪氏所論，則中國私人藏書史最早始於板刻發明以後，如此一來，五代以前中國毫無私家藏書，然這與事實相去甚遠。

還有許多人是以前「收藏數量」來界定是否可以稱為中國古代的「藏書家」，卻完全忽略書籍的演化歷程以及时空背景。例如現存清末記載江蘇地方藏書故實的名著常昭合志稿，收錄藏書家的標準為「是皆有書萬卷以上，而且專心篤好者。其以餘事及之者，則不在是。」(註11)亦有根據藏書紀事詩的收錄情況，推出至少應收藏百種以上者才堪稱為「藏書家」(註12)。還有稍微客觀一點的說法，提出藏書家之所以稱為「家」，至少應具有一定數量的藏書(註13)，至於實際數目則未加闡明。以上諸說看似縝密，然皆不切實際，所謂「萬卷」、「百種」或其他標準，都是後人主觀的認定，完全脫離歷史研究的法則。通常史料記載藏書數量，除少數詳細載明數字外，很多是寫萬卷、千卷、百卷、十卷(可能是「千卷」的筆誤)、數車、數架、數屋……等；有時甚至是幾埭內府、甚多、甚豐、汗牛充棟、連屋列架、疊床架屋、藏書盡室、滿屋皆書、牙籤緗帙，錦帶縹囊、一室燦然、滿床圖史……等形容詞。若以嚴謹的學術態度來查考，大多數的記載都很不確實，除非有藏書目錄可供比對計算，否則很可能只是古人筆法上用來形容藏書「很多」的意思而已，無法符合今人眼中「萬卷」或「百種」的標準。

必須注意的是，古代某人藏書會出現在史料的記載上，不論其收藏數量多寡或有無記載收藏數量，該人當時即是以藏書聞名，才會載入文獻中，不可用現今的眼光或條件去加以限制，否則將會扭曲歷史的真實面向，此當為歷史研究的通則，許多其他領域從事藏書史研究的學者往往沒有注意到這個層面。

因為歷來學界並沒有給中國古代「藏書家」一個合理的定義或解釋，使得今日許多藏書研究者都在自己著作中私定凡例，說明藏書家收錄的依據或準則，至於客不客觀，則由讀者自行判斷。此法雖易造成爭議，卻是目前唯一比較能夠符合各領域的研究目的，進而獲得多數學者採用且較為可行的辦法。例如楊立誠(1888-1931)與金步瀛(1898-1966)合著之中國藏書家考略一書，在凡例中聲明蒐羅藏書家的原則為：「上起秦漢、下迄清末，凡生平確有藏書事蹟者，略為甄錄。」(註14)至於「生平確有藏書事蹟」的標準，則由作者主觀地判定。潘美月的大作宋代藏書家考，共收錄藏書家126人，亦於文前說明收錄標準有三：第一、凡前人著述已見記載者，不論其藏書多寡，但求其資料可考，皆予收錄。第二、凡藏書在萬卷以上，或數十年聚書，孜孜讎校者，即使前人著述未載，亦收錄之。第三、凡有藏書目錄流傳於當世者，雖不詳其收藏情形，亦加以收錄(註15)。潘氏作法揉合今古與各家成果，採「聯集」的方式

且明訂標準，不失客觀原則，故此法為很多學者所承襲。

由於中國自古以來的典籍形態歷經數次變遷，種類因而呈現多樣化，許多藏書研究者為求全面，便憑藉個人的閱讀經驗，以及對古代「藏書家」記載的敏感程度，不斷從史料中發掘出更多的「藏書家」，甚至包含許多異於一般書籍形式之各類文獻載體的收藏者，也都統稱為「藏書家」。例如李玉安與陳傳藝合著的《中國藏書家辭典》，羅列藏書家共計1149人，自述其標準為收錄歷代藏書家、目錄學家、圖書館事業家、有成就的圖書館官員、板本學家、校勘學家、刻書家等人物(註16)，而統稱為「藏書家」。而梁戰與郭群一合著的《歷代藏書家辭典》，收錄更達3400人，強調書中收錄中國各朝各代的「藏書家」，包括書畫碑刻收藏家、板本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刻書家(出版家)、圖書館事業家，以及書坊販書家等(註17)，使得中國古代藏書的內涵更加包羅萬象，也讓「藏書家」的定義更為豐富。

至於鄭偉章所撰《文獻家通考》一書，則抱持不同的見解。鄭書蒐羅清初至現代的「藏書家」共1500餘人，卻名之以「文獻家」而非「藏書家」。他自稱之所以擬名《文獻家通考》，以其不僅紀藏書，亦紀校書、勘書、刻書、輯書及書目、題識等，認為應以「文獻家」概之，如此則更為貼切(註18)。若按鄭氏之意，則藏書家、校讐家、出版家、鑑賞家、目錄學家，應該統稱為「文獻家」，但這與世人習稱文獻收藏者為「藏書家」或「收藏家」，在習慣上有些許不同。近來，也有學者跳脫以往「藏書數量」或「藏品形態」對古代藏書家定義的限制，認為中國古代的「藏書家」應該是指私家藏書的開創者，或是私家藏書的傳人，以及皇家藏書的管理者和那些對於藏書事業做出貢獻的人(註19)。而這種說法，似乎也較能符合古代的時空背景，可以兼融不同時代的典籍類型與收藏文化，更接近歷史事實。

三、明人對「藏書家」的認知

(一)明人對「藏書」的印象與意識

考諸史料，古代的「藏書家」固然有些單純地只收藏刻本型式的書籍者，但也有不少人兼收鼎彝器物、法書名畫及其他類型的古董或文物(註20)。尤其明代許多藏書家注重專題收藏，並形成特色，諸如：范氏「天一閣」偏好收藏地方志與登科錄；高儒、洪楹、臧懋循、祁氏「澹生堂」的戲曲收藏；以項元汴(1525-1590)為代表的書法、繪畫等專題收藏，豐坊(1492-1563)、范欽(1506-1585)、范大澈(1524-1610)的碑帖、印章收藏等(註21)。因此，不可能將「藏書家」與其他「收藏家」截然分清(註22)。這種藏書兼雜收藏各種形態的文獻、古董的收藏取向，在明代顯得特別鮮明。明代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眾多的「藝術家」中，不少人酷愛藏書事業；而「藏書家」對投入藝文活動

的熱衷，也屬空前。當時「藏書家」以其對藝術靈敏感觸而成為「書畫家」，然而善本書籍不僅為文學作品而已，其文字與裝裱之典雅也是藝術品，讓「書畫家」也非常喜歡收藏，於是兼為「藏書家」，並經常可從藏書中洞察所蘊含的情景與哲理，再使其書法或繪畫轉趨深邃(註23)。這使得明人書齋的陳設具有二大特點：一是古代文物成為明人書齋必定收藏的對象，而這種風氣也深深影響著藏書活動，使得藏書不僅多宋元板本，亦兼收古法書名畫、器物彝鼎之類的古董，此當與傳統文士的好古天性以及明代文學復古運動有深切的關聯性。二是明代文人崇尚學藝，法書名畫已是書齋不可或缺的陳設主角(註24)。正因如此，藏書與書畫、古器收藏頓時結合成為文壇與社會的風潮時尚，突顯出明代藏書事業的一大特色(註25)。

就明代而論，何者謂「書」？其實，明人對於「書」的內涵與界定相當模糊，涵蓋典籍、金石遺文、法書名畫，甚至其他不同類型的文獻載體，而總稱為「圖籍」。例如崇禎·吳縣志記載吳縣藏書家都穆(1459-1525)時，云其「尤長於鑒古，圖籍甚富，而秦漢石刻尤多，其或魚魯，輒就竄正。」(註26)若按其意，概將「石刻」、「碑搨」等文獻也列為「圖籍」之一。而西園聞見錄記載秀水沈誥(1501-1553)與其子沈啟原(1526-1591)父子藏書時，亦言：

沈憲副啟原平生珍玩寶瑤、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雖樂收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即百朋不啻也。(註27)

所以，從沈氏藏書的內容可以看出時人對於「書」的認知，除典籍外，還包括古籍刻本(古董)和手鈔書，甚至朋從之間相互往還的信件，也都被稱為「書」。至於引文所指沈家的「金匱石室之藏」，另據時人描述沈氏「酷嗜墳籍，若古法書名畫及先代金石之遺，不惜重資畢購之，日事披閱，以此忘老。…」(註28)的一段記載，亦可看出沈氏藏書恐怕還包含許多法書字帖、金石遺文、圖畫卷軸、彝鼎器物等藝術品。又如明代中葉無錫藏書家華夏(1490-1563)，藏書處所名為「真賞齋」，其友文徵明(1470-1559)述云：

「真賞齋」者，吾友華中甫氏(華夏)藏「圖書」之室也。中甫端靖喜學，尤喜古法書、圖畫、古今石刻及鼎彝器物。…法書之珍，有鍾太傅(鍾繇，151-230)《薦季直表》、王右軍(王羲之，303-361)《袁生帖》、虞永興(虞世南，558-638)《汝南公主墓銘起草》、王方慶(王綝，?-702)《通天進帖》、顏魯公(顏真卿，709-785)《劉中使帖》、徐季海(徐浩，703-782)《絹書道經》，皆魏、晉、唐賢劇蹟，宋、元以下不論也。金石有周穆王(姬滿)《壇山古刻》、蔡中郎(蔡邕，132-192)《石經殘本》、《淳化帖》。初刻《定武》、《蘭亭》，下至《黃庭》、《樂毅》、《洛神》、《東方畫贊》諸刻，則

其次也。圖畫器物，抑又次焉，然皆不下百數。於戲！富矣！（註29）觀文氏所言，可以確知在明人書樓裡，絕非單純地只收今人所謂的刻本「書」而已，往往還充斥著一些書法、圖繪與器物等古董或文物。而文氏既稱「真賞齋」為華夏的「藏圖書之室」，第審其所藏，卻又不止於典籍，還包含不少法書名畫、器物鼎彝等古代文獻，數目之多，恐又不下於刻本書籍，而文氏皆總稱為「圖書」，足見明人所謂「典籍」的意念。又如常熟藏書家楊儀（1488-？），今依時人所撰明常熟先賢事略載楊氏藏書，亦云：「構萬卷樓，聚書其中，率多宋元舊本及名人墨蹟、鼎彝古器之屬，固不可勝數」（註30），也將書畫與古器物並列為「聚書」的內容。觀此，「圖書」一詞，在明代所涵蓋的文獻內容與形態，確實相當廣泛且多樣。

（二）明人對圖書收藏者的稱謂

由於明代藏書界藏品類型的複雜，囊括典籍、金石書畫、器物鼎彝，以及其他文獻載體，所以當時對圖書收藏者的稱謂很多。有稱「藏書家」者，如明分省人物考描述長洲文人錢穀（1508-1572）的藏書典故時，稱其「家貧無所得書，則遍謁藏書家，就而讀之。」（註31）又如嘉靖時，海鹽藏書家王文祿曾談到家藏陰符經本欲付梓出版，但苦於沒有他板可供讎校參考，乃不敢貿然出書，「于是數訪藏書家，弗得。」（註32）而西園聞見錄記載明宗室周府鎮國將軍朱睦㮮（1517-1586）的藏書事蹟時，為標榜其藏書數量之龐大，宣稱當時「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盡購得之。起萬卷堂，日諷誦其中。」（註33）又明末福建長樂人謝肇淛（1567-1624）也曾經說過：「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註34）明末姚士粦也說：「吾郡未嘗無藏書家，卒無有以藏書聞者，蓋知以祕惜為藏，不知以傳布同好為藏耳！」（註35）

必須注意的是，古人所謂「藏書家」或「某氏藏書」，除可專指藏書家「個人」外，有時也可以被解釋為藏書家的「家庭」或「家族」之全稱。譬如海寧州志稿載：「許勉煥，字陶初。父進士惟楷，構一可堂於西偏，廣蓄典籍，勉煥復擴充之，邑中號藏書家。」（註36）而明人皇甫汸（1497-1582）作「董氏西齋藏書記」一文，記載上海董宜陽（1510-1572）藏書，便稱董氏三代為「董氏藏書」。記云：

西齋者，「董氏藏書」所也。世居上海之沙岡，自御史公（董綸，宜陽祖父）起家，繼大理公（董恬，宜陽父），咸嗜學修文，購古書籍至千餘卷。生子宜陽，幼聰慧不凡。兩世居家號清白，乏簞金繼錢之遺，每指西齋謂曰：「業在是矣！」二公既卒，董子非獨能守其業，又能盡讀其書，搜奇括秘，所藏倍其先人。（註37）

明末清初的蘇州大藏書家錢謙益（1582-1664）曾論及當時晉江藏書家黃虞

稷(1629-1691)父子，也以「晉江黃氏」稱黃氏父子藏書，他說：「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註38)西園聞見錄載揚州葛氏藏書，亦云：「葛澗，字子東，其先鳳陽人，父欽，始徙江都家焉。欽以孝弟力田，彌嗜古書，構樓五楹，所藏書數千卷，至澗益至萬餘卷，江淮稱積書者，無如葛氏。」(註39)以上諸「藏書」或「藏書家」，皆指家庭或家族。至於嘉善藏書家陳山毓(1584-1621)論其鄉藏書故實，則說道：

吾邑陋，文獻故罕，以故「藏書家」無聞云，獨坤儀袁先生(袁黃)耽精典籍，爰自蚤歲，迄乎曳杖之年，卷弗去手，故所得書稱富。而吾先君(陳于王，1554-1615)雅同斯好，哀聚萬卷，然以視「藏書家」，無俟望洋向若而始旋其面目矣！(註40)

陳氏則直呼鄉人袁黃為「藏書家」，非常明顯地是專指「個人」而言。另一方面，陳氏所言亦隱約透露他對「藏書家」標準的看法，觀其描述鄉人袁先生「卷弗去手，故所得書稱富」，因可稱為「藏書家」，可以想見陳氏認為「藏書家」必須收藏很多書，而且必須善用所藏才足以稱之。

至於明末清初太倉文人吳偉業(1609-1671)，對「藏書家」的認知標準就比較寬鬆，嘗作「汲古閣歌」，中云：

嘉隆以後「藏書家」，天下毘陵(唐順之，1507-1560)與琅邪(王世貞，1526-1590)，整齊舊聞汲放失，後來好事知誰及？(註41)

按吳氏歌中所指，「藏書家」必須具備對於資訊或知識主動地去進行徵集、管理、組織、傳播流通等工作的性格，也就是具備當時所謂的「好事」精神。約同其時，秀水藏書家曹溶(1612-1677)在所作流通古書約也說：「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先經註，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註42)曹氏也稱圖書收藏者為「藏書家」，提倡藏書流通，可互觀各家藏書目錄，足見當時藏書家大多編製家藏書目。而向以明代遺民自居的秀水藏書家朱彝尊(1629-1709)，其論補綴廣韻以求完書之辛勤時，亦云：「吳下張上舍籲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鈔本，證以藏書家所傳抄。…」(註43)也是直呼某人或某家為「藏書家」。

另有稱「藏書之家」者。明代中葉江陰藏書家李詡(1505-1593)曾說：「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錢仁夫，1446-4526)、楊憲副五川先生(楊儀)，真今之鄴架也。」(註44)乃盛讚錢氏藏書之多，因而成「家」。又如明末福建長樂文人謝肇淛(1567-1624)，也說：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陸禔、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註45)

以上二人皆稱圖書收藏者「個人」為「藏書之家」(註46)，然不同於楊氏，謝肇淛定義「藏書家」的條件不在藏書數量多寡，應該如同朱鬱儀一般好學博覽，雖「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謝氏卻仍目之為「藏書家」。

又如嘉靖年間，文徵明於吳縣縣學重刻舊唐書時，敘云：「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材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寒暑乃克就緒。」(註47)而崑山文人張大復(1554-1630)為鄉人龔珣作傳時，亦云：

性好「藏書」，周急為務，賓從戚友至者如歸。或有遇病痲死喪憂患，雖倒廩傾篋，無吝於懷。有以書售者，即賣金必購之。人或高其價以相給，亦無所問，故一時「藏書之家」，能先屈人指。(註48)

細思其言，張氏稱龔珣「性好藏書」，因買書不計其價，故稱之為「能先屈人指」的「藏書之家」，卻未列其藏書數量，亦可見張氏對「藏書家」的標準，實取決於圖書收藏者的「收藏態度」積極與否，而非收藏數量的多寡。餘姚遺老黃宗羲(1610-1695)也曾言及明末的江南藏書界，曰：「是時藏書之家不至窮困，故無輕出其書者。間有宋集一、二部，則爭得之矣。」(註49)

亦有稱為「藏書者」。明末閩人樂純在討論藏書貴在利用與流通時，說道：「因錄架插萬軸諸人，以為藏書者千萬莫作書奴也。」(註50)又如清初平湖藏書家李延是(1628-1697)也曾說：「王海槎(王燿)田近百畝，而藏書萬七千卷。鄉里笑其迂，海槎曰：『藏書者固迂，然使子孫雖不肖，幸可徐供老蠹魚些許巢窟，冀其三食神仙字，猶不失與之作緣。』」(註51)樂、李二人，皆稱圖書收藏者為「藏書者」。

還有稱「儲書家」或「儲藏家」。例如前引西園聞見錄載秀水沈氏父子的藏書事業時，云及：「或少缺略，借之儲書家，…。」便是一例。又如秀水朱彝尊論家藏編珠四卷時，也曾經說道：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高士奇，1645-1703)，按其目補之。…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為創獲也。(註52)

朱氏稱圖書收藏者為「儲藏家」。還有稱「嗜古之士」或「嗜古者」。明末嘉興文人費元祿曰：「夫嗜古之士，上梯層崖，下追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亡不搜集。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註53)且思費氏所言，其對「藏書家」的認知著重在性格特徵，而不問收藏數量，標準在於其人是否具備「嗜古」與「典籍之癖」的人格而已。華亭藏書家陳繼儒(1558-1639)也曾說：「嗜古者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墟墓碑版如見先瓏間物，豈更落樵採不思呵護耶？」(註54)觀此，姑不論書畫、家譜、碑刻或其他文獻型態，只要有收藏行為，在明人的眼裡都可算是「藏書」。

另有直呼為「收藏者」、「好事收藏家」或「收藏家」的。明中葉仁和藏書

家郎瑛(1487-1566)因恐家藏宋濂詩湮滅不傳，乃抄錄備份，喜云：「苟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于稿，則又傳遞一番，彰者眾矣，亦慊收藏者之情」(註55)，即稱藏書家為「收藏者」。此外，嘉興藏書家李日華(1565-1635)也曾經告訴友人曰：「不佞不揣，將於諸好事收藏家力出其珍圖祕襲，與諸君參玩，庶星源一得而曲流委渚，迢然自暢於襟腑矣！」(註56)李氏篤意藏書，志在與人共賞，卻也道出明代藏書家的另一種稱謂。

華亭藏書家陳繼儒為其友董其昌(1555-1636)作傳時，亦云：「輦轂收藏家又時時願得公賞鑒，一品題為重。」(註57)而明末清初常熟藏書家錢曾(1629-1701)追憶同鄉書友時，亦稱圖書收藏者為「收藏家」，他說：「君亡來三十餘年，遍訪海內收藏家，罕有如君之真知真好者，每嘆讀書種子，幾乎滅絕矣。」(註58)約同其時，秀水朱彝尊也以「收藏家」稱呼圖書收藏者。他目睹家藏唐會要殘闕不全，曾經慨然嘆道：「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註59)也將收藏圖書的人稱為「收藏家」。

(三)明人對「藏書家」定義的批判

明人在評論「藏書家」高下賢愚時，喜歡擬之為古董或書畫收藏者，這也許和明人對「藏書」的論調是從總結前人或本身收藏古董與書畫的經驗析出或衍生的，有很大的關係。例如明人趙世顯便曾經說過：

古玩有好事、賞鑒二家，惟書亦然。牙籤緗帙，錦帶縹囊，列架充棟，鬪靡誇多，此「好事家」也。尋行數墨，考訂校讎，勤攻強記，醉其醜而飽其腴，耽玩不釋，涵泳無已，非「賞鑒家」乎？書不逢賞鑒而遇好事，始於汗牛而終於飽蠹，吁！可哀也哉！(註60)

趙氏從收藏古玩累積的經驗出發，提出藏書與收藏古董的相同點，也就是勤學好讀者稱為「賞鑒家」，徒尚觀美而不知善用者稱為「好事家」。浙江藏書家胡應麟(1551-1602)則以收藏繪畫引申到藏書，提出：

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為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緬青緗，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註61)

雖然胡氏從主觀上認為「雅尚」不算藏書家，事實上還是將藏書家分為三種類型。其區分標準是從藏書的動機及實際表現出發，即「好事家」類係純為觀美而收藏，乃附庸風雅；而「賞鑒家」類則為好讀嗜書、閉戶窮經者。至於「雅尚」之家，則視書為鑒賞物品，如同字畫與古董，完全是為收藏而收藏(註62)。此外，誠如趙氏將藏書比喻古玩，胡氏將藏書視若繪畫，足見明人對文物收藏和典籍收藏意念的混同，以及關於典籍、古玩與書畫等文獻載體的認知，其

緊密的關聯程度不言而喻。

歷來許多「藏書家」僅務競多尚美，卻藏而不讀，雖說有辱藏書之名，其實仍是「藏書家」。因此，即便歷來學者試圖以「藏書家」自身的好學程度或其收藏品的使用率來分別「藏書家」的高下等第，但只要有收藏圖書的行為，仍然都可歸為「藏書家」。誠如明末高濂所云：

「藏書者」無問冊帙美惡，惟欲搜奇索隱，得見古人一言一論之祕，以廣心胸未識未聞。致於夢寐嗜好，遠近訪求，自經書子史，百家九流，詩文傳記，稗野雜著，二氏經典，靡不兼收。故常景耽書，每見新異之典，不論價之貴賤，以必得為期，其好亦專矣。(註63)

所謂私家藏書，是指典籍圖書的私人收藏活動(註64)，凡以收藏書籍為嗜好者，皆可謂為「藏書家」(註65)。大致說來，歷來「藏書家」皆性好典籍，這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儘管他們對藏書的利用各不相同(註66)，也不會影響其「藏書」之實。且就明代來看，書籍雖已演變至「裝訂紙本」的印刷型態，然鑑於明人的「復古」、「尚奇」風氣，以及對「書籍」和其他類型的文獻、古董等文物的混同意識，因此，對於「藏書家」的標準條件，不論在人(藏書行為)與物(藏品內容或數量)的要求上，都顯得比較寬鬆。以下再舉數例說明，用為揀擇明代藏書家的參考。

考之現存明代史料對於當時藏書家的敘述或記載，實際上大多並未論及藏書數量，也沒有突顯藏書活動的各項專業，反而是強調該人對圖書典籍的熱愛而已，以此作為「藏書家」形象的描繪。例如明末歸安藏書家姚翼在其作「玩畫齋藏書目錄序」中自述：

余嘗觀世之貴游公子，往往馳心於金玉、珠璣、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間或厭苦世俗而稍務為清虛者，則或奇花、怪石或古器、圖畫，終其身淋漓燕嬉於其中而不出。…余自少無他好，不惟於世俗之所沈酣如金玉、珠璣之類略不以溜乎其心，雖花石、畫品為清虛之士所崇尚者，亦所欲不存。而其私心之所癖而不舍者，乃獨在古今之簡策。(註67)

「玩畫齋」為姚氏藏書之處，並編製藏書目錄，已具藏書之實。然上文對「藏書家」的自述，並未強調其書目的內容或特性，反而在說明其對典籍的癖嗜之深，藉以標榜個人的「藏書」行為。又如無錫藏書家周子義(1529-1586)，據其傳載：「於物無所嗜好，所嗜好獨書，祿賜購積餘萬卷，咸手自校讐。」(註68)這類敘述對藏書的數量交代模糊，沒有列出詳細數字，僅稱逾萬卷而已，卻刻意強調癖嗜圖書，手自校讐等性格特徵，用此記載「藏書家」的故實。

秀水藏書家朱彝尊指出：「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註69)由於雕板印刷的普及，大

量印行的結果使得書籍價格到明末已大為降低，因此，對於當時喜歡讀書的文人來說，藏書數量與明人印象中「藏書家」的典型沒有太多關聯，惟有收藏勤勉，以及對典籍的瘋狂熱愛，才是明人認定的「藏書」表率。誠如陳繼儒所言：「書不厭多，亦不厭少，若欲誇籤軸之浩繁，裝裹之華煥，雖嘉則、麗正、崇文所藏，亦復何益？」(註70)甚至只要家有奇書，即使數量不多，也被視為藏書。明人王褒(? -1416)便抱持這樣看法，他說：「予惟昔張昭遠藏書萬卷，構樓居之，號曰書樓。李谿家有奇書，人亦以書樓目之。樓之稱雖不同，皆藉書而有聞也。」(註71)

此外，明代的抄書活動相當盛行(註72)，抄書是文人勤讀的表現之一，因此，許多私人藏書是以抄書而成「家」的。皇明詞林人物考記載長洲藏書家王穀祥(1501-1568)的藏書事蹟，云：「先生有書癖，所抄錄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註73)文中雖對王氏藏書的數量、書目或其他藏書專業沒有太多紀錄，然王氏抄錄古文籍之工整與勤勉，且蓄積至數百千卷，雖透過抄書，鑑於明人對典籍認知的廣泛，自然也可視為「藏書家」。與王穀祥一樣，吳縣藏書家顧德育(1503-?)的藏書紀錄也是如此。據其傳載：「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註74)雖說較之宋、元時期，明代書籍價格已顯得穩定與低廉，但若與當時的物價相比，書籍仍是奢侈品，絕非一般百姓或低層官吏的微薄收入所能負擔。當時一個七品官的每月薪俸，僅能買幾部平常的書而已。因此，要想成為「藏書家」，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註75)。所以，如同顧氏因「抄書」而「積書」的藏書家，在明代非常普遍。

到了明末清初，也有以文人著述多寡來論列是否為「藏書家」者。如丹陽文人姜紹書指出：「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攷，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類推。」(註76)並歸結出明代藏書家54位，其中多數是後代藏書家的研究成果所不載。從歷史的橫向方面考察，凡是一地方文人多，著述多，必然藏書就多。再由縱向考察，累朝歷代無論經學家、史學家，只要有著述傳世者，無不具備數量相當可觀的書籍之藏(註77)，因此，只要能從當朝史料找到其人嗜癖典籍、熱愛圖書的記載，都可能成為「藏書家」。而這種以著述多寡來推結藏書家的做法，甚至沿襲到清末，武林藏書錄述明末仁和藏書家吳任臣時，便云：「當兵燹之餘，留心經籍，生平著作等身，觀其引徵之多，即可見其收藏之富矣！」(註78)

四、結 論

當今學者認為藏書文化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有書，正式的圖書必須具備三項條件，一有一定符號(文字或圖畫)所表達的內容；二有一定形式的專用載體；

三有廣泛的移動和傳播功能。而最後一項是圖書最重要的條件，唯此纔能使人類文化得以傳播、豐富和發展而形成一種文化現象。所以，甲骨和金石文字只能稱為「檔案」，中國圖書的最早形態應是「簡書」(註79)。其實，這種見解仍未脫今人對「書」的成見，卻存在很多問題，不但沒有通盤考量中國書籍發展歷程的時代階段性，也忽略未來對書籍定義的變動性，是對中國文獻載體變遷以及時代背景不夠了解而導致的武斷說法。筆者認為，不論「檔案」或「簡書」，都是今人對現存文物的看法或稱謂，而當時的古人卻可能全都視為「書」。且按照這三個「書」的條件，古代的「令牌」或「紙幣」是否也應該稱為「書」呢？而「檔案」與「書」的定義也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與區分，收藏「檔案」算不算是「藏書」？

事實上，中國書籍的載體形式不斷在發展改變。自古以來，被使用在書寫文字的載體大致上有甲骨、銅、竹木、縑帛、石刻、玉、鐵、陶器、鉛、蒲、羊皮、紙等(註80)，而「藏書」一詞也不斷地被重新定義。其實，圖書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歷史的必然。將來必定出現更多形形色色的知識載體，只要這些新型載體的內容能夠被用來傳播知識，可以被人們閱讀，為什麼不能稱為「圖書」呢(註81)？在現代社會中，恐怕已經很少人認為以光碟或各式記憶體為載體的電子書不是「圖書」。「圖書」應該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在不同時代，圖書的內涵可能會隨著有很大的差異。古人所認知的「圖書」概念與今人的理解不同，而今人所理解的「圖書」概念亦勢必與未來人們所理解的不同(註82)。所以，今日「藏書」是指收藏圖書、報刊等各類紙質文獻和其他載體文獻，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藏書」的範圍又擴展為聲像型、縮微型和機讀型的文獻。而古代的「藏書」則除收藏紙質的圖書外，還應該擴展到收藏其他的文獻類型才是(註83)。

未來，或許科技能利用其他的媒介，甚至不須透過任何文字或圖像以及載體便能將知識傳輸至人類頭腦中，屆時「圖書」的概念又將改變。因此，筆者認為基於歷史研究的客觀原則，探討一個朝代或某一時期的制度、事件或生活文化，必須立足於當時的角度與觀念，並考量當時的社會環境，如此的考察必定比較接近事實。以研究明代的藏書文化來說，若採取後世對圖書形式的觀點來進行，在藏書家數量以及藏書活動等方面的研究上將會導致偏執的結果，如此則無法客觀地呈現主題的真實面貌。所以，最合適的方法，當是由明人對「藏書」的概念出發，利用明代的史料來解釋明代藏書史，最為允當。

清人顧廣圻(1766-1835)曾經說過：「予嘗欲搜訪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聞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或不致有名氏翳如之歎，此亦好古者之責也。」(註84)善哉！其言，後人多蓄此志。然囿於識見，或限之以載體形式，或難之以藏書數量，卻全然不重史料，殊為可憾！所謂藏書史，是指

不同時代的圖書典籍，依照確定的編排體系，從而實施管理、保存與流通的歷史(註85)。這裡面涵蓋的層面很廣，其中包含著許多藏書領域的專門學問，以及歷史上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專題研究。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正確認知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的真諦，一定要以古代私家藏書的史實為基礎及依據(註86)，切忌以後世的觀點而恣意妄取，以免造成時空上的誤解。本文認為，有明一代「藏書家」一詞的定義顯得比較不受限制，「藏書家」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混合概念，舉凡著述家及其後代、書畫收藏者、碑刻古器收藏者，以及古今書籍(包含軸、卷、冊、抄本等非今日所認定為書籍的載體形式)的收藏者，不論收藏量的多寡，藏書目錄的有無，只要其人癖好藏書、熱愛圖書，均可按照史料上的記載，視當時藏書活動與文獻徵集的關聯程度，將之列為明代的「藏書家」。

誌 謝

由衷感謝兩位評審委員的指正與教導，使本文減少很多的錯誤。本文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7年研究計畫補助，特此誌謝。

註 釋

註1 范鳳書指出：「何謂藏書家？『藏書家』這個專用名詞術語，已經使用了千年左右，但幾乎沒有人對它下過定義，做過說明和分析。…對『藏書家』因為沒有一個公認的界定標準，所以從已出版的眾多有關私家藏書的專著看，對其理解和使用實在有些混亂，相當多的專著收錄寬泛無際、無標準可言。有的名為藏書家專著，竟將圖書館官員、目錄學家、抄書手、裝訂工匠混同收錄。有的僅據一部藏書，一條題跋，一個印章，或文獻中僅記其『性嗜書』、『精校書』、『精鑒古』、『好古人書畫器物』、『唯以圖史自娛』就都視為藏書家而一律收錄。有的收錄根本不見一字藏書故實。這些情況很值得再作商榷研究。愚意，『藏書家』這一稱號，必須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必須是『多書』，即有相當數量的超過一般人的收藏。…第二，其所收藏圖書，必具相當的質量。…第三，藏家本人應進行一定的整理和應用。」其實，此三條件的規範與界定仍然相當模糊，例如：何謂「相當數量的超過一般人的收藏」？又如何才算「有質量」與「一定的整理和應用」？可惜范氏於此並沒有確切的標準與說明。詳見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2001)，頁7-8、172。其實，范氏早先便曾經針對以上三個條件發表專文加以討論，然其觀點卻不免流於狹隘、空泛和主觀。例如范氏以歷代藝文志或經籍志的收錄數量為基準，卻對此數據與當時藏書家的藏書數量標準有何關係沒有加以說明，僅主觀地以個人看法定出標準。茲舉一例，漢書藝文志收錄漢代圖書13269卷，范氏便因而訂定符合漢代以前藏書家條件的基本藏書數量「應達數百卷以上」，卻毫無任何解釋，可謂全然沒有說服力，而其餘朝代亦同。又如其認為古代藏書家藏書質量的標準，在於所藏典籍中古經書、諸子書、正史、歷代重要叢書、類書、詩文集、名家別集、文學名著、各學科代表著述等類書籍，不得低於收藏總量的1/10至1/5。事實上，大多數古代藏書家的藏書目錄皆無從查考，如何得知其收藏內容？而所云「1/10至

1/5」，以及所舉諸類典籍，亦皆為范氏個人的主觀說法，完全缺乏史實根據，容易引發爭議。譬如古代專門收藏小說、戲曲、醫書、佛道等諸家，則無法列入藏書之林，如此將可能與歷史事實相悖。詳見范鳳書，「藏書家的概念、定義、內含和界說」，圖書館雜誌 3 期（1993）：頁 15-18。

註 2 見（明）臧懋循，「負苞堂詩選文選」，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台南：莊嚴文化，1997），卷 3，頁 42。顧志興指出：「在浙江的藏書家中，有一位為研究藏書史的同志所忽視，…他就是元曲選的編纂者臧懋循。在鄭元慶的湖錄、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吳晗的兩浙藏書家史略中皆不錄臧懋循的藏書事蹟，其實我以為他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位藏書家。」見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1987），頁 126。

註 3 黃氏自謂：「予以嘉慶壬戌（7 年，1802）遷居縣橋，構專室貯所有宋槧本書，名之曰『百宋一廬』。」見（清）顧廣圻撰、黃丕烈注，百宋一廬賦注（台北：世界書局，1980），1。劉兆祐指出：「黃氏偏愛宋板書，…而自己也自號為『佞宋主人』。」見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台北：台灣書店，1997），頁 237。其實，宋板書至黃氏建樓收藏之時，已歷超過五百年之久，堪稱文物或古董，然今日皆以「藏書家」目之。

註 4 王國強，「明代藏書事業歷史背景探論」，山東圖書館季刊 3 期（1993）：頁 14。

註 5 劉意成，「私人藏書與古籍保存」，圖書館雜誌 3 期（1983）：頁 60-61。

註 6 毛昭晰，「浙江藏書家之精神」，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黃建國、高躍新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1。

註 7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1998），卷 3，頁 46。

註 8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1986），前言，頁 3。

註 9 詳見趙飛鵬，「洪亮吉藏書家有五等說考辨」，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頁 753-763。

註 10 洪有豐，清代藏書家考（九龍：中山圖書，1973），頁 2。

註 11 （清）鄭鍾祥等，「藏書家」，常昭合志稿（台北：中央研究院藏清光緒甲辰 30 年活字本），卷 32，頁 21。

註 12 陳曙，「論私家藏書」，四川圖書館學報 1 期（1992）：頁 68。

註 13 劉意成，「古代私人藏書家對保存圖書文獻的貢獻」，贛圖通訊 4 期（1983）：頁 32。

註 14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台北：文海，1971），頁 3。

註 15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台北：學海，1980），頁 7。

註 16 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1989），凡例，頁 1。

註 17 梁戰、郭群一，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1991），凡例，頁 1。

註 18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一現代）（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10。

註 19 王余光，藏書四記（武漢：湖北辭書，1998），頁 333。

註 20 明代江南藏書家兼收書畫的風氣非常興盛，使得藏書家與書畫收藏家往往相互結合，很難區別。請參見陳冠至，「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的書畫收藏風尚」，故宮學術季刊 23 卷，4 期（2006）：頁 1-40；陳冠至，「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的書畫收藏

活動」, 明史研究專刊 15 期(2006 年 10 月): 頁 81-114。

註 21 顧志興, 浙江藏書史(杭州: 杭州, 2008), 頁 184-186。

註 22 沈振輝, 「元明時期的收藏學」, 中國典籍與文化 1 期(1999): 頁 56。

註 23 賴福順, 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 頁 162-163。

註 24 暴鴻昌, 「明清時代書齋文化散論」, 齊魯學刊 2 期(1992): 頁 100。

註 25 傅璇琮、謝灼華, 中國藏書通史(寧波: 寧波, 2001): 頁 668-669。

註 26 (明) 牛若麟等, 崇禎·吳縣志(上海: 上海書店, 1990), 卷 41, 頁 25。

註 27 (明) 張萱, 「西園聞見錄」, 在明代傳記叢刊。周駿富編。(台北: 明文書局, 1991), 卷 8, 頁 24。

註 28 (明) 陸可教, 「陸學士先生遺稿」, 在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北京: 北京, 2000), 卷 12, 頁 15。

註 29 (明) 郁逢慶, 「書畫題跋記」, 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清) 紀昀等總纂。(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卷 5, 頁 1-2。

註 30 (明) 馮復京, 「明常熟先賢事略」, 在明代傳記叢刊。周駿富編。(台北: 明文書局, 1991), 卷 13, 頁 151-152。

註 31 (明) 過庭訓, 「明分省人物考」, 在明代傳記叢刊。周駿富編。(台北: 明文書局, 1991), 卷 24, 頁 254。

註 32 (明) 王文祿, 陰符經疏略(北京: 中華書局, 1991), 書前序, 頁 3。

註 33 傅璇琮、謝灼華, 中國藏書通史, 頁 709。

註 34 (明) 謝肇淛, 五雜俎(上海: 上海書店, 2001), 卷 13, 頁 264。

註 35 (清) 葉昌熾, 藏書紀事詩(台北: 世界書局, 1980), 卷 3, 頁 160。

註 36 許傳霽等, 海寧州志稿(台北: 成文, 1983), 卷 30, 頁 15。

註 37 (明) 皇甫汸, 「皇甫司勳集」, 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清) 紀昀等總纂。(台北: 台灣商務, 1986), 卷 49, 頁 15-16。

註 38 (清) 錢謙益, 牧齋有學集(上海: 上海古籍, 2003), 卷 26, 頁 995。

註 39 (明) 張萱, 「西園聞見錄」, 頁 22。

註 40 (明) 陳山毓, 「陳靖質居士文集」, 在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北京: 北京, 2000), 卷 5, 頁 9。

註 41 (清) 葉昌熾, 藏書紀事詩, 卷 2, 頁 112。

註 42 (清) 曹溶, 流通古書約(台北: 興中書局), 頁 2。

註 43 (清) 朱彝尊, 曝書亭集(台北: 世界書局, 1989), 卷 34, 頁 429。

註 44 (明) 李詡, 戒庵老人漫筆(北京: 中華書局, 1997), 卷 5, 頁 200。

註 45 (明) 王文祿, 陰符經疏略, 頁 265。

註 46 「藏書之家」指「個人」的說法, 清高宗時曾由官方認定。高宗欲纂修四庫全書, 命徵訪天下書籍至京, 於乾隆 39 年(1774) 7 月 25 日下令: 「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 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 可稱為『藏書之家』。」見(清) 永瑤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97), 卷首, 頁 9。政令中明顯指出「藏書之家」是指「個人」。此令為中國史上首次官方對「藏書家」含義的強制規定, 可知前此對「藏書家」的定義必定是相當廣泛與模糊。

註 47 (明) 文徵明, 文徵明集(上海: 上海古籍, 1987), 卷 17, 頁 470。

註 48 (明) 張大復, 吳郡張大復先生明人列傳稿(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7), 頁 155。

- 註49 (明)黃宗羲,《思舊錄》(台北:隆言,1969),頁17。
- 註50 (明)樂純,「雪菴清史」,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台南:莊嚴文化,1997),卷5,頁511。
- 註51 (清)李延昉,「南湖舊話錄」,在筆記小說大觀。新興書局編。(台北:新興書局,1986),卷下,頁24。
- 註52 (明)皇甫汈,「皇甫司勳集」,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清)紀昀等總纂。(台北:台灣商務,1986),卷35,頁433-434。
- 註53 (明)費元祿,「甲秀園集」,在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北京:北京,2000),卷42,頁10。
- 註54 (明)陳繼儒,「妮古錄」,在筆記小說大觀。新興書局編。(台北:新興書局,1976),卷3,頁7。
- 註55 (明)郎瑛,《七脩類稿》(北京:文化藝術,1998),卷35,頁437-438。
- 註56 (明)李日華,《恬致堂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卷36,頁29。
- 註57 (明)董其昌,《容臺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書前行狀,頁2。
- 註58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4-15。
- 註59 (明)皇甫汈,「皇甫司勳集」,卷45,頁545。
- 註60 (明)趙世顯,「趙氏連城」,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台南:莊嚴文化,1997),卷2,頁149。
- 註61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台北:世界書局,1980),卷4,頁62。
- 註62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2001),頁103。任氏的看法雖說字面上與胡應麟原文相悖,但實際上頗能道出當時收藏界的人物類型。譬如秀水藏書家項元汴(1525-1590)便是如此,明末姜紹書曾批評項元汴的收藏心態宛如商賈之行,曰:「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歸之如流。…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繆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于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見(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卷下,頁7。考姜氏所言,若按胡應麟的標準,項元汴絕非藏書家。但事實上,後世幾乎無人認為項氏不是藏書家,而諸藏書家研究成果亦皆存項氏之名。以是胡氏之言可能只是出自個人不屑此種類型的藏書家,而任氏之解釋乃指出當時亦有這種類型的藏書家而已。
- 註63 (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北京:書目文獻),卷14,頁410。
- 註64 (清)鄭鍾祥等,《常昭合志稿》,頁67。
- 註65 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1996),頁168。
- 註66 周少川,「論古代私家藏書的類型」,文獻4期(1998),頁162。
- 註67 (明)姚翼,「玩畫齋雜著編」,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台南:莊嚴文化,1997),卷2,頁3。
- 註68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碑傳」,在明代傳記叢刊。周駿富編。(台北:明文書局,1991),卷67,頁20。
- 註69 (明)皇甫汈,「皇甫司勳集」,卷66,頁769。
- 註70 (明)陳繼儒,「晚香堂集」,在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北京:北京,2000),頁18。

註71 (明)王褒,王養靜全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藏明萬曆16年序刊本),文集卷1,頁34。

註72 關於明代江南文人的抄書活動與習尚,請參閱陳冠至,「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1期(2009年6月):頁115-143。

註73 (明)王兆雲,「皇明詞林人物考」,在明代傳記叢刊。周駿富編。(台北:明文書局,1991),卷9,頁376。

註74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卷116,頁54。

註75 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期(1996年6月):頁117。

註76 (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卷上,頁1。

註77 劉尚恒,「略論中國藏書文化」,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黃建國、高躍新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27-28。

註78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台北:世界書局,1980),卷下,頁57。

註79 來新夏,「中國藏書文化漫論」,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5卷,1期(1998):頁43。

註80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台北:文史哲,1988),頁4-10。

註81 鄭如斯、肖東發,中國書史(北京:書目文獻,1996),頁312。

註82 陳力,中國圖書史(台北:文津,1996),頁2-3。

註83 黃顯功、張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2002),頁1。

註84 (清)顧廣圻撰、黃丕烈注,百宋一廬賦注,頁19。

註85 焦樹安,中國古代藏書史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1。

註86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9),頁6。

A Discussion on Defini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Collectors in Ming Dynasty

Kuan-Chih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080677@mail.fju.edu.tw

Abstract

The book collection research contents are extremely rich, including each kinds of collection agencie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as well as book itself, and such as the book collection, purchase, identification, preservation, research, loss,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those customs are related closely to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about publishing, bookmen, circu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al culture that arise from the customs of book collection, they are all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deserve to study deeply. However, the research of book-collecting history are always limited from the definition of ancient book collector, because of the recognition about the books in each period of time in ancient were different, and became a primary question of research in book-collect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Surveying the research of the book-collecting, there are no any professional books or essays in definiens of Chinese book collectors. In fact, it's hard to define it clearly. This article helps to realize the ancient book collectors clear by source books, discussing and expl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book collectors in Ming Dynasty.

Keywords: *Book collector; Definition; Ming Dynasty; Book-collecting history*

SUMMARY

Since the diverse book formats and bibliopegy have been changing over time and the bibliophiles were rarely labeled as book collectors in ancient historical books, it is hard for researchers to define book collector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s and even the researchers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In fact, this difficulty originated from the various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 of ancient book collectors, which was made by researchers who usually depend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dynasty and their own research fields and purposes. Literally, any one who is called a book collector should have made some special achievements in the professional book collecting field. Howev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modern studies on the Chinese book collections revealed that most scholars tended to acknowledge book collector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evidence: what

they saw and heard; someone's book collecting activity or interest identified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r, the book volumes that the collectors possessed. Since the definition of book collectors has been purely based on each researcher's own judgment and selection, occasionally, even some antique collectors or non-book material collectors were accepted as book collectors, which has been very controversial. In recent years, though many scholars tried to make efforts to look for a reasonable definition for the book collectors in ancient China, there is still broad discrepancy.

In the history, some literature collectors were also called book collectors such as those who loved collecting a certain type of antiques or special format materials. Th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Zang Mao Xun (臧懋循) (?-1621) who lived in the late-Ming preferred collecting dramas and novels; Huang Pi Lie (黃丕烈) (1763-1825) who lived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famous for collecting rare books from the Song Dynasty. Actually, the books from the Song Dynasty are antiques for those living in th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novels are not the main stream classics fo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garding the time when the collectors were living, it is debatable that if the collection of these literatures can be called book collection.

Further, for any ancient scholar, purchasing or copying books was a normal learning behavior for them. Although they were not meant to become book collectors, some scholars possessed a huge amount of books. For this occasion, should these scholars be included as book collectors? One more question arises regarding the book sellers. For quite a few ancient booksellers who were good at bibliography, their book collecting purpose was making profit only. Should they be called book collectors? Concerning the above questions, today's scholars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It is not easy at all for anyone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nd objective definition for book collectors.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in which a variety of book formats appeared such as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stone or metallic surfaces of steles, tablets, walls, bronze vessels or even jewels,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manuscripts, etc. Until the printing became common and the printed books were largely circulated, more and more changes happened to the book formats.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mainstream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arriers, people started to have different impression and perception on books, book collections, or book collecto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ince the prerequisites of book collections held by the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were very flexible, the definition of book collectors seemed to be unlimited. For the Ming people, book collectors was a broad and mixed concept which included authors and their offspr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llectors, rubbing

and antiques collectors, and ancient or contemporary book collectors. No matter the amount of collections, the purposes, there was the catalog of the collections or not, as long as the collector was a bibliomania, or bibliophil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y can be called book collectors according to their records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We must not use a modern point of view and definition to standardize the concept of the Ming book collectors.

ROMANIZED & TRANSLATED NOTES FOR ORIGINAL TEXT

註4 王國強 [Kuo-Chiang Wang], 「明代藏書事業歷史背景探論」[“Mingdai Cangshu Shiye Lishi Beijing Tanlun”], 山東圖書館季刊 3期(1993) [*Shandong Library Quarterly* 3(1993)]: 頁14[p. 14]。

註5 劉意成 [I-Cheng Liu], 「私人藏書與古籍保存」[“Siren Cangshu Yu Guji Baocun”], 圖書館雜誌 3期(1983) [*Tushuguan Zazhi* 3(1983)]: 頁60-61[pp. 60-61]。

註6 毛昭晰 [Chao-His Mao], 「浙江藏書家之精神」[“Zhejiang Cangshujia Zhi Jing-shen”], 在 [In] 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 [*Zhongguo Gudai Cangshulou Yanjiu*]。黃建國 [Chien-Guo Huang]、高躍新編 [Tueh-Hsin Kao (Eds.)]。(北京: 中華書局, 1999) [(Beijing: Chunghwa Book, 1999)], 頁1[p. 1]。

註7 (清) 洪亮吉 [(Ching Dynasty) Liang-Chi Hung], 北江詩話 [*Beijiang Shihua*] (北京: 人民文學, 1998) [(Beijing: Renmin Wenxue, 1998)], 卷3 [Vol. 3], 頁46[p. 46]。

註8 鄭偉章 [Wei-Chang Cheng]、李萬健 [Wan-Chien Li], 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 [*Zhongguo Zheming Cangshujia Chuanlue*] (北京: 書目文獻, 1986) [(Beijing: Shumu Wenxian, 1986)], 前言 [Foreword], 頁3[p. 3]。

註9 詳見趙飛鵬 [Fei-Peng Chao], 「洪亮吉藏書家有五等說考辨」[“Liang-Ji Hong Cangshujia You Wudengshuo Kaobian”], 在 [In] 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I-Jen Chang Xiansheng Qizhi Shiuqing Lunwenji*]。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I-Jen Chang Xiansheng Qizhi Shiuqing Lunwenji Bianjiweiyuanhui (Eds.)]。(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9) [(Taipei: Student Books, 1999)], 頁753-763[pp. 753-763]。

註10 洪有豐 [You-Feng Hong], 清代藏書家考 [*Chingdai Cangshujia Kao*] (九龍: 中山圖書, 1973) [(Kowloon: Chungshan Tushu, 1973)], 頁2[p. 2]。

註11 (清) 鄭鍾祥等 [(Ching Dynasty) Chung-Hsiang Cheng], 「藏書家」[“Cangshujia”], 常昭合志稿 [Changzhaohezhi] (台北: 中央研究院藏清光緒甲辰30年活字本) [(Taipei: Academia Sinica Cang Qingguangxu Jiachen 30nian Huoziben)], 卷32 [Vol. 32], 頁21[p.21]。

註12 陳曙 [Shu Chen], 「論私家藏書」[“Lun Sijiacangshu”], 四川圖書館學報 1期(1992) [*Journal of The Sichuan Society for Library Science* 1(1992)]: 頁68[p. 68]。

註13 劉意成 [I-Cheng Liu], 「古代私人藏書家對保存圖書文獻的貢獻」[“Gudai Siren Cangshujia Dui Baocun Tushuwenxian De Gongxian”], 贛圖通訊 4期(1983) [*Gantu Tongxun* 4(1983)]: 頁32[p. 32]。

註14 楊立誠 [Li-Cheng Yang]、金步瀛 [Pu-Ying Chin], 中國藏書家考略 [*Zhongguo Cangshujia Kaolue*] (台北: 文海, 1971) [(Taipei: Wenhai, 1971)], 頁3[p. 3]。

註15 潘美月 [Mei-Yueh Pan], 宋代藏書家考 [*Songdai Cangshujia Kao*] (台北: 學

海，1980) [(Taipei: Xuehai, 1980)], 頁7[p. 7]。

註16 李玉安 [Yu-An Li]、陳傳藝 [Chuan-I Chen]，中國藏書家辭典 [Zhongguo Cangshujia Cidian] (武漢：湖北教育，1989) [(Wuhan: Hubei Jiaoyu, 1989)]，凡例 [Fanli]，頁1[p. 1]。

註17 梁戰 [Chan Liang]、郭群一 [Chun-I Kuo]，歷代藏書家辭典 [Lidai Cangshujia Cidian] (西安：陝西人民，1991) [(Xian: Shanxi Renmin, 1991)]，凡例 [Fanli]，頁1[p. 1]。

註18 鄭偉章 [Wei-Cahng Cheng]，文獻家通考 [Wenxianjia Tongkao] (清—現代) [Qing-Xiandai] (北京：中華書局，1999) [(Beijing: Chunghwa Book, 1999)]，頁10[p. 10]。

註19 王余光 [Yu-Guang Wang]，藏書四記 [Cangshusiji] (武漢：湖北辭書，1998) [(Wuhan: Hubei Cishu, 1998)]，頁333[p. 333]。

註21 顧志興 [Chih-Hsing Ku]，浙江藏書史 [Zhejiang Cangshushi] (杭州：杭州，2008) [(Hangzhou: Hangzhou, 2008)]，頁184-186[pp. 184-186]。

註22 沈振輝 [Chen-Hui Shen]，「元明時期的收藏學」 [Yuan Ming Shiqi De Shou-cangxue]，中國典籍與文化 1期 (1999) [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1(1999)]：頁56[p. 56]。

註23 賴福順 [Fu-Shun Lai]，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 [Chingdai Tianlu Linlang Cangshu Yinji Yanjiu]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Taipei: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頁162-163[pp. 162-163]。

註24 暴鴻昌 [Hung-Chang Pao]，「明清時代書齋文化散論」 [“Ming Ching Shidai Shuzhai Wenhua Sanlun”]，齊魯學刊 2期 (1992) [Qilu Xuekan 2(1992)]：頁100[p. 100]。

註25 傅璇琮 [Shuan-Tsung Fu]、謝灼華 [Cho-Hua Hsieh]，中國藏書通史 [Zhongguo Cangshu Tongshi] (寧波：寧波，2001) [(Ningbo: Ningbo, 2001)]：頁668-669[pp. 668-669]。

註26 (明) 牛若麟等 [(Ming Dynasty) Jo-Lin Niu et al.]，崇禎·吳縣志 [Chongzhen • Wuhsien Zhi] (上海：上海書店，1990)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1990)]，卷41 [Vol. 41]，頁25[p. 25]。

註27 (明) 張萱 [(Ming Dynasty) Hsuan Chang]，「西園聞見錄」 [“Xiyuan Wenjianlu”]，在 [In] 明代傳記叢刊 [Mingdai Chuanji Congkan]。周駿富編 [Tsin-Fu Chow (Ed.)] (台北：明文書局，1991) [(Taipei: Mingwen Shuju, 1991)]，卷8 [Vol. 8]，頁24[p. 24]。

註28 (明) 陸可教 [(Ming Dynasty) Ke-Chiao Lu]，「陸學士先生遺稿」 [“Hsueh-Shih Lu Xiansheng Yigao”]，在 [In] 四庫禁燬書叢刊 [Sikujinhuisu Congkan]。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 [Sikujinhuisu Congkan Bianjiweiyuanhui (Eds.)] (北京：北京，2000) [(Beijing: Beijing, 2000)]，卷12 [Vol. 12]，頁15[p. 15]。

註29 (明) 郁逢慶 [(Ming Dynasty) Feng-Ching Yu]，「書畫題跋記」 [“Shuhua Tiba Ji”]，在 [In]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Jingyin Wenyuange Sikuanquanshu]。(清) 紀昀等總纂 [(Ching Dynasty) Yun Chi et al.]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卷5 [Vol. 5]，頁1-2[pp. 1-2]。

註30 (明) 馮復京 [(Ming Dynasty) Fu-Ching Feng]，「明常熟先賢事略」 [“Mingchangshou Xianxianshilue”]，在 [In] 明代傳記叢刊 [Mingdai Chuanjicongan]。周駿富編 [Chun-Fu Chow (Ed.)] (台北：明文書局，1991) [(Taipei: Mingwen Shuju, 1991)]，卷13 [Vol. 13]，頁151-152[pp. 151-152]。

註31 (明)過庭訓[(Ming Dynasty) Ting-Hsun Kuo],「明分省人物考」[“Mingfensheng Renwu Kao”, 在[In] 明代傳記叢刊[Mingdai Chuanjicongkan]。周駿富編[Chun-Fu Chou (Ed.)]。(台北：明文書局，1991)](Taipei: Mingwen Shuju, 1991)]，卷24[Vol. 24]，頁254[p. 254]。

註32 (明)王文祿[(Ming Dynasty) Wen-Lu Wang]，陰符經疏略[Yingfujin Shulue](北京：中華書局，1991)](Beijing: Chunghwa Book, 1991)]，書前序[Preface]，頁3[p. 3]。

註33 傅璇琮[Hsuan-Tsung Fu]、謝灼華[Cho-Hua Hsieh]，中國藏書通史[Zhongguo Cangshu Tongshi]，頁709[p. 709]。

註34 (明)謝肇淛[(Ming Dynasty) Chao-Chih Hsieh]，五雜俎[Wuzazu](上海：上海書店，2001)](Shanghai: Shanghai Shuju, 2001)]，卷13[Vol. 13]，頁264[p. 264]。

註35 (清)葉昌熾[(Ching Dynasty) Chang-Chih Yeh]，藏書紀事詩[Cangshu Jishishi](台北：世界書局，1980)](Taipei: The World Book, 1980)]，卷3[Vol. 3]，頁160[p. 160]。

註36 許傳霽等[Fu-Pei Hsu et al.]，海寧州志稿[Haining Zhouzhigao](台北：成文，1983)](Taipei: Chengwen, 1983)]，卷30[Vol. 30]，頁15[p. 15]。

註37 (明)皇甫汙[(Ming Dynasty) Fang Huangfu]，「皇甫司勳集」[“Huangfu Six-unji”]，在[In]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清)紀昀等總纂[(Ching Dynasty) Yun Chi et al.]。(台北：台灣商務，1986)](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卷49[Vol. 49]，頁15-16[pp. 15-16]。

註38 (清)錢謙益[(Ching Dynasty) Chien-I Chien]，牧齋有學集[Muzhaiyouxueji](上海：上海古籍，2003)](Shanghai: Shanghai Guji, 2003)]，卷26[Vol. 26]，頁995[p. 995]。

註39 (明)張萱[(Ming Dynasty) Hsuan Chang]，「西園聞見錄」[“Xiyuan Wenjianlu”]，頁22[p. 22]。

註40 (明)陳山毓[(Ming Dynasty) Shan-Yu Chen]，「陳靖質居士文集」[Ching-Chih Chen Jushi Wenji]，在[In] 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jinhuishu Congkan]。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Sikujinhuishu Congkan Bianjiwenyuanhui (Eds.)]。(北京：北京，2000)](Beijing: Beijing, 2000)]，卷5[Vol. 5]，頁9[p. 9]。

註41 (清)葉昌熾[(Ching Dynasty) Chang-Chih Yeh]，藏書紀事詩[Cangshu Jishishi]，卷2[Vol. 2]，頁112[p. 112]。

註42 (清)曹溶[(Ching Dynasty) Jung Tsao]，流通古書約[Liutong Gushuyue](台北：興中書局)](Taipei: Xingzhong Shuju)]，頁2[p. 2]。

註43 (清)朱彝尊[(Ching Dynasty) I-Tsun Chu]，曝書亭集[Pushutingji](台北：世界書局，1989)](Taipei: The World Book, 1989)]，卷34[Vol. 34]，頁429[p. 429]。

註44 (明)李詡[(Ming Dynasty) Hsu Li]，戒庵老人漫筆[Jieanlaoren Manbi](北京：中華書局，1997)](Beijinh: Chunghwa Book, 1997)]，卷5[Vol. 5]，頁200[p. 200]。

註45 (明)王文祿[(Ming Dynasty) Wen-Lu Wan]，陰符經疏略[Yingfujin Shulue]，頁265[p. 265]。

註47 (明)文徵明[(Ming Dynasty) Cheng-Ming Wen]，文徵明集[Wenchengmingji](上海：上海古籍，1987)](Shanghai: Shanghai Guji, 1987)]，卷17[Vol. 17]，頁470[p. 470]。

註48 (明)張大復[(Ming Dynasty) Ta-Fu Chang]，吳郡張大復先生明人列傳稿[Wujun Ta-Fu Chang Xiansheng Mingren Liechuangao](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Taipei: Student Books, 1987)]，頁155[p. 155]。

註49 (明)黃宗羲[(Ming Dynasty) Tsung-His Huang]，思舊錄[Sijiulu](台北：隆言，

1969) [(Taipei: Lungyen, 1969)], 頁 17[p. 17]。

註 50 (明)樂純[(Ming Dynasty) Chun Yue], 「雪菴清史」[“Xuean Qingshi”], 在 [In]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quanshu Cunmucongshu]。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Sikuquanshu Cunmucongshu Bianzuanweiyuanhui (Eds.)]。(台南：莊嚴文化，1997) [(Tainan: Solemn Culture, 1997)], 卷 5 [Vol. 5], 頁 511 [p. 511]。

註 51 (清)李延昆[(Ching Dynasty) Yen-Shi Li], 「南湖舊話錄」[“Nanhu Jiuhualu”], 在 [In] 筆記小說大觀 [Biji Xiaoshuo Dagan]。新興書局編 [Xinxing Shuju, (Eds.)]。(台北：新興書局，1986) [(Taipei: Xinxing Shuju, 1986)], 卷下 [Vol. 2], 頁 24 [p. 24]。

註 52 (明)皇甫汈[(Ming Dynasty) Fang Huangfu], 「皇甫司勳集」[“Huangfu Sixunji”], 在 [In]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清)紀昀等總纂 [(Ching Dynasty) Yun Chi et al.]。(台北：台灣商務，198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卷 35 [Vol. 35], 頁 433-434 [pp. 433-434]。

註 53 (明)費元祿[(Ming Dynasty) Yuan-Lu Fei], 「甲秀園集」[“Jiaxiuyuanji”], 在 [In] 四庫禁燬書叢刊 [Sikujinhuishu Congkan]。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 [Sikujinhuishu Congkan Bianjiweiyuanhui (Eds.)]。(北京：北京，2000) [(Beijinh: Beijing, 2000)], 卷 42 [Vol. 42], 頁 10 [p. 10]。

註 54 (明)陳繼儒[(Ming Dynasty) Shi-Ju Chen], 「妮古錄」[“Nigulu”], 在 [In] 筆記小說大觀 [Biji Xiaoshuo Dagan]。新興書局編 [Xinxing Shuju, (Eds.)]。(台北：新興書局，1976) [(Taipei: Xinxing Shuju, 1976)], 卷 3 [Vol. 3], 頁 7 [p. 7]。

註 55 (明)郎瑛[(Ming Dynasty) Ying Lang], 七脩類稿 [Qixiuleigao] (北京：文化藝術，1998) [(Beijing: Wenhuyayishu, 1998)], 卷 35 [Vol. 35], 頁 437-438 [pp. 437-438]。

註 56 (明)李日華[(Ming Dynasty) Jih-Hua Li], 恬致堂集 [Tianzhitangji]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71)], 卷 36 [Vol. 36], 頁 29 [p. 29]。

註 57 (明)董其昌[(Ming Dynasty) Chi-Chang Tung], 容臺集 [Rongtaiji]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68)], 書前行狀 [Shuqian Xingzhuang], 頁 2 [p. 2]。

註 58 (清)錢曾[(Ching Dynasty) Tseng Chien], 讀書敏求記 [Dushu Minqiuji]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6)], 頁 14-15 [pp. 14-15]。

註 59 (明)皇甫汈[(Ming Dynasty) Fang Huangfu], 「皇甫司勳集」[“Huangfu Sixunji”], 卷 45 [Vol. 45], 頁 545 [p. 545]。

註 60 (明)趙世顯[(Ming Dynasty) Shih-Hsien Chao], 「趙氏連城」[“Zhaoshih Liancheng”], 在 [In]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quanshu Cunmucongshu]。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Sikuquanshu Cunmucongshu Bianzuanweiyuanhui, (Eds.)]。(台南：莊嚴文化，1997) [(Tainan: Solemn Culture, 1997)], 卷 2 [Vol. 2], 頁 149 [p. 149]。

註 61 (明)胡應麟[(Ming Dynasty) Ying-Lin Hu], 少室山房筆叢 [Shaoshi Shanfang Bicon] (台北：世界書局，1980) [(Taipei: The World Book, 1980)], 卷 4 [Vol. 4], 頁 62 [p. 62]。

註 63 (明)高濂[(Ming Dynasty) Lian Gao], 雅尚齋遵生八牋 [Yashangzhai Zunsheng Bajian] (北京：書目文獻) [(Beijing: Shumu Wenxian)], 卷 14 [Vol. 14], 頁 410 [p. 410]。

註 64 (清)鄭鍾祥等[(Ching Dynasty) Chung-Hsiang Cheng], 常昭合志稿 [Changzhao Hezhi Gao], 頁 67 [p. 67]。

註65 錢杭[Hang Qian]、承載[Zai Cheng]，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Shiqishiji Jiangnan Shehui Shenghuo*]（杭州：浙江人民，1996）[（Hangzhou: Zhejiang People, 1996），頁168[p. 168]。

註66 周少川[Shao-Chuan Zhou]，「論古代私家藏書的類型」[“On Types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Ancient Times”]，文獻4期（1998）[*Documents* 4(1998)]: 頁162[p. 162]。

註67（明）姚翼[(Ming Dynasty) I Yao]，「玩畫齋雜著編」[“Wanhua Zhaiza Zhebian”]，在[In]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quanshu Cunmucongshu*]。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Sikuquanshu Cunmucongshu Bianzuanweiyuanhui* (Eds.)]。（台南：莊嚴文化，1997）[（Tainan: Solemn Culture, 1997）]，卷2[Vol. 2]，頁3[p. 3]。

註68（明）王世貞[(Ming Dynasty) Shi-Zhen Wang]，「弇州山人續稿碑傳」[“Yanzhou Shanren Xugao Beichuan”]，在[In]明代傳記叢刊[*Mingdai Chuanji Congkan*]。周駿富編[*Tsin-Fu Chow* (Ed.)]。（台北：明文書局，1991）[（Taipei: Mingwen Shuju, 1991）]，卷67[Vol. 67]，頁20[p. 20]。

註69（明）皇甫汴[(Ming Dynasty) Fang Huangfu]，「皇甫司勳集」[“Huangfu Sixunji”]，卷66[Vol. 66]，頁769[p. 769]。

註70（明）陳繼儒[(Ming Dynasty) Ji-Ru Chen]，「晚香堂集」[“Wanxiang Tangji”]，在[In]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jinhuishu Congkan*]。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Sikujinhuishu Congkan Bianjiwenyuanhui* (Eds.)]。（北京：北京，2000）[（Beijing: Beijing, 2000）]，頁18[p. 18]。

註71（明）王褒[(Ming Dynasty) Bao Wang]，王養靜全集[*Wangyangjing Quanji*]（台北：中央研究院藏明萬曆16年序刊本）[（Taipei: Academia Sinica Cangming Wanli Shilunian Xukanben）]，文集卷1[Wenji Vol. 1]，頁34[p. 34]。

註73（明）王兆雲[(Ming Dynasty) Zhao-Yun Wang]，「皇明詞林人物考」[“Huangming Cilin Renwukao”]，在[In]明代傳記叢刊[*Mingdai Chuanji Congkan*]。周駿富編[*Tsin-Fu Chow* (Ed.)]。（台北：明文書局，1991）[（Taipei: Mingwen Shuju, 1991）]，卷9[Vol. 9]，頁376[p. 376]。

註74（明）焦竑[(Ming Dynasty) Hong Jiao]，國朝獻徵錄[*Guochao Xianzhenglu*]（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Taipei: Student Book, 1965）]，卷116[Vol. 116]，頁54[p. 54]。

註75 沈津[Jin Shen]，「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Circulation and Price of Books as Bookstores in Ming Dynasty”]，國家圖書館館刊1期（1996年6月）[*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lletin* 1(June 1996)]: 頁117[p. 117]。

註76（明）姜紹書[(Ming Dynasty) Shao-Shu Chiang]，韻石齋筆談[*Yunshizhai Bitan*]（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Yangzhou: Jiangsu Guangling Guji Keyinshe, 1995）]，卷上[Vol. 1]，頁1[p. 1]。

註77 劉尚恒[Shang-Heng Liu]，「略論中國藏書文化」[“Luelun Zhongguo Cangshu Wenhua”]，在[In]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Zhongguo Gudai Cangshulou Yanjiu*]。黃建國[*Jian-Guo Huang*]、高躍新編[*Yue-Xin Gao* (Eds.)]。（北京：中華書局，1999）[（Beijing: Chunghwa Book, 1999）]，頁27-28[pp. 27-28]。

註78（清）丁申[(Ching Dynasty) Shen Ting]，武林藏書錄[*Wulin Cangshu Lu*]（台北：世界書局，1980）[（Taipei: The World Book, 1980）]，卷下[Vol. 2]，頁57[p. 57]。

註79 來新夏[Hsin-Hsia Lai]，「中國藏書文化漫論」[“A Talk on the Chinese Culture of Book Collection”]，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5卷，1期(1998)[*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5, no. 1(1998)]：頁43[p. 43]。

註80 張秀民[Xiu-Min Zhang]，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Zhongguo Yinshuashu De Faming Jiqi Yingxiang*](台北：文史哲，1988)[(Taipei: Wenshizhe, 1988)]，頁4-10[pp. 4-10]。

註81 鄭如斯[Ru-Si Zheng]、肖東發[Dong-Fa Xiao]，中國書史[*Zhongguo Shushi*](北京：書目文獻，1996)[(Beijing: Shumu Wenxian, 1996)]，頁312[pp. 312]。

註82 陳力[Li Chen]，中國圖書史[*Chinese Books History*](台北：文津，1996)[(Taipei: Wenchin, 1996)]，頁2-3[pp. 2-3]。

註83 黃顯功[Xian-Gong Huang]、張偉[Wei Zhang]，現代家庭藏書文化[*Xiandai Jiating Cangshu Wenhua*](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2002)[(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2002)]，頁1[p. 1]。

註84 (清)顧廣圻撰[(Ching Dynasty) Guang-Gi Gu]、黃丕烈注[Pi-Lie Huang]，百宋一廬賦注[*Baisong Yichan Fuzhu*]，頁19[p. 19]。

註85 焦樹安[Shu-An Chiao]，中國古代藏書史話[*Zhongguo Gudai Cangshu Shihua*](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頁1[p. 1]。

註86 周少川[Shao-Chuan Zhou]，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Library and Culture: Gudai Sijia Cangshu Wenhua Yanjiu*](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9)[(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999)]，頁6[p. 6]。